

金融投资理财
investment

全球经济政治背后推手的真实传奇

THE HOUSE OF
ROTHSCHILD

[英] 尼尔·弗格森◎著

罗斯柴尔德家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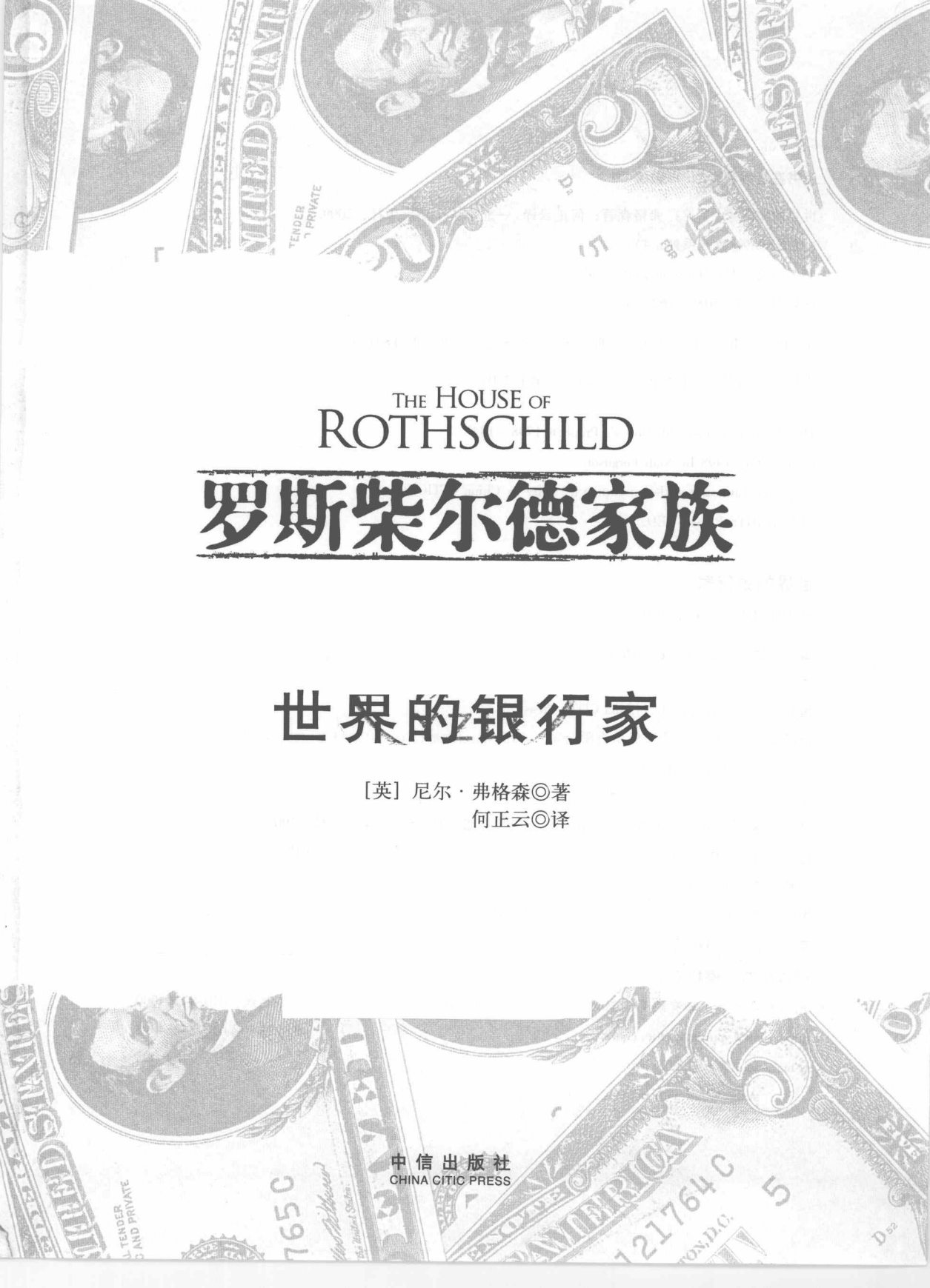
第四部

世界的银行家

它是一个神秘的金融家族
传说它操纵着整个金融市场
它是货币战争的幕后主使吗？
它到底有怎样的发家史和真面目？



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The background of the entire cover is a collage of various US dollar bills, including one-dollar, five-dollar, and ten-dollar bills, arranged in a somewhat chaotic, overlapping manner. The bills are shown in different orientations, some partially cut off by the edges of the page. The text is overlaid on this background.

THE HOUSE OF
ROTHSCHILD

罗斯柴尔德家族

世界的银行家

[英] 尼尔·弗格森◎著
何正云◎译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界的银行家/ (英) 弗格森著; 何正云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09. 9

(罗斯柴尔德家族系列; 4)

书名原文: The House of Rothschild

ISBN 978-7-5086-1623-0

I. 世… II. ①弗…②何… III. 金融—经济史—世界 IV. F83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32205 号

The House of Rothschild; Money's Prophets 1798-1848

Copyright © 1998 by Niall Ferguson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 2009 by China CITIC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世界的银行家

SHIJIE DE YINHANGJIA

著 者: [英] 尼尔·弗格森

译 者: 何正云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十三区 35 号煤炭大厦 邮编 100013)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印者: 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1.25 字 数: 39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京权图字: 01-2008-3955

书 号: ISBN 978-7-5086-1623-0/F·1691

定 价: 42.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010-84264000

<http://www.publish.citic.com>

服务传真: 010-84264033

E-mail: sales@citicpub.com

author@citicpub.com

THE HOUSE OF
ROTHSCHILD

目 录

第一章 ----- 犹太问题 (1874 ~ 1885 年)	1
反犹太人主义	5
家族的回答	20
第二章 ---- “站在帝国主义一边” (1874 ~ 1885 年)	35
帝国的金融政治：埃及	49
其他的东方问题	60
从投资到投兵	67
第三章 ----- 政党政治	79
自由主义追求	80
政治斗争	87
统一主义	92
与政治家的关系	98
法国的保守主义	104
第四章 ---- 帝国的风险与收益 (1885 ~ 1902 年)	109
非官方的帝国风险：巴林家族的危机	110

“坚定的单一本位主义者”	120
地下帝国	125
罗德斯与罗斯柴尔德家族	132
官方帝国主义的陷阱：波尔战争	144
 第五章 ----- 金融与联盟 (1885 ~ 1906 年)	 151
未能打起来的战争	152
法俄同盟	158
意大利	170
英德友好	172
协定的背景	184
英俄对抗	193
奥地利	201
 第六章 - 军事—经济的复杂交错 (1906 ~ 1914 年)	 207
影响经济的政治	216
一场“恐怖的战争”	231
 第七章 ---- 战争与家族危机 (1915 ~ 1945 年)	 245
第五代	247
战争的影响	251
影响力的衰退	263
大崩溃	277
由辱骂到政治行动	284
 后 记 -----	 299
 致 谢 -----	 331

第一章 犹太问题 (1874~1885 年)

先生们，如果你们不支持我们，我们将不得不放逐你们……如果你们支持我们，我们将让你们比你们家族那位老成持重的创始人更加伟大，或者事实上成为他最引以为傲的子孙，这是他做梦都想不到的……我们将会使你们变得高贵，因为我们将从你们的家族产生第一位选举出来的王子。

——西奥多·黑泽尔，《对罗斯柴尔德家族委员会的讲话》，1895 年

罗斯柴尔德家族与更为广泛的欧洲犹太人社区的关系，在进入到第四代的时候，总体来说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对于前面提到的贵族通婚，我们必须强调那是属于特例事件。大多数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仍然还是与其他犹太人通婚。事实上，这一时期真正显著的变化是，婚姻另外一方的那些犹太人不再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在第三代，这样的婚姻只有三例，其中的两例事实上还是与女性一脉的表亲。第一例真正的外面的犹太人加入到家族里来的是意大利实业家拉尔蒙多·弗兰凯蒂男爵，他在 1858 年娶了安瑟尔姆的女儿莎拉·路易丝；第二年，赛西莉·安斯帕希嫁给了古斯塔夫。贝蒂和她的儿媳妇阿德勒对赛西莉所怀有的憎恶，让我们了解了一个这样的外来者要赢得家族的承认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在 1877 年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与其他犹太社会精英的婚姻迅速成为了一种常见的事情。在 1878 年，威尔海姆·卡尔的女儿米娜嫁给了马克斯·戈尔德施密特，她的姐妹是莫里斯·德·赫希的妻子。同族通婚仍然持续不断的一个例子，是米娜的儿子阿尔伯特在 1910 年娶了埃德蒙的女儿米瑞娅姆——这个时候，他的父亲已经启用了冯·戈尔德施密特·罗斯柴尔德的名字，而且已经贵族化了。在这一时期与法国罗斯柴尔德家族建立了姻亲关系的另一个家族是阿尔芳：在 1905 年，阿尔方索的

儿子爱德华娶了吉曼·阿尔芳，而在1909年，埃德蒙的儿子莫里斯又娶了她的妹妹诺艾米。

这种王朝式的联盟的最好例子出现在罗斯柴尔德家族与萨逊家族之间，这个家族在印度和远东地区发家，其中的部分人在这一时期定居到了英格兰。1881年，在一个有威尔士王子出席的仪式上——这个活动受到了报纸的广泛关注——里奥娶了玛丽·佩卢贾，她是特瑞斯特商人阿奇尔·佩鲁贾的女儿，而他的另一个女儿嫁给了阿瑟·萨逊。另一个与萨逊家族的联系出现在1887年，当时古斯塔夫的女儿艾琳嫁给了爱德华·萨逊爵士，他是阿尔伯特·萨逊的儿子和继承人。然后在1907年，古斯塔夫的儿子罗伯特娶了奈丽·彼尔，新娘子的家族也是通过婚姻与萨逊家族搭上了关系。在这一代人中，所有其他人的婚姻都是与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富裕的犹太人之间发生的。这些标志着19世纪中叶的排外婚姻彻底结束，并且把罗斯柴尔德家族——尽管仍然起着带头作用——更广泛地融入到了与富裕的犹太人家族建立姑表亲关系的体系内。

因此，罗斯柴尔德仍然保持着值得信赖的犹太传统；事实上，通过这些通婚，他们变得不再拒犹太人社区于千里之外。确实，曾经出现过宗教信仰方面不够坚定的事情，而且还不只是在康斯坦丝的例子中。阿尔方索和莉奥诺拉刚出生的儿子勒内由于割礼后发生（丹毒）感染而惨死的悲剧，使夏洛特的灵魂深处受到了强烈的震动。她也吃惊于威尔海姆·卡尔及其家庭遵守饮食戒律的严格。“像他们那样的吃法……”她评论道，“脸色惨白而虚弱，好像根本就什么都没有吃，比那些苦修的人还要糟糕。”当他们长期分离后在法兰克福相遇时，纳蒂认为他的叔叔威尔海姆·卡尔“看起来很像高加索人，就是化妆也达不到这样的效果。他的步态和表情以及说话的方式完全是犹太人的方式，没有任何他自己的特征”。然而，纳蒂自己对祖先宗教的忠诚也是不容置疑的。作为一名大学生，他非常反感帕雷的《基督的圣迹》那门课，认为是“我所看到过的最晦涩的文字的堆砌，因此根本不存在很多人所预言的我会被改变的事情”。里奥也被迫花了很多的时间去上帕雷的课，但是他自己所描述的与他的叔叔安东尼和堂弟阿尔伯特在1869年参加维也纳犹太聚会时所表现出来的热情不会有假。当1877年在贝斯沃特的圣彼得堡区建立新的

犹太会堂的时候，奠基的人就是里奥，这与他父亲在 7 年前修建中央会堂时几乎如出一辙。

和他们之前的祖父与父亲一样，纳蒂与他的兄弟们并不非常关注那些理论细节或者宗教仪式。例如，在 1912 年，有报告说纳蒂“不认为讨论犹太浴室的形状和大小是一个正统犹太人所必需的”。对于他们来说，宗教的意义在于犹太人社区的组织和功能；而作为罗斯柴尔德，他们认为自己应该清楚自己在英格兰犹太人社区的世俗领袖地位。19 世纪末期，他们在这个位置上所取得的成就是非凡的。纳蒂从 1879 年起任联合公会总裁至他 1915 年去世（尽管他很少过问那些日常的事务）。在 1868 ~ 1941 年间，理事会财政负责人一直就是由罗斯柴尔德担任，从未间断过：第一任是费迪南德（1868 ~ 1874 年），然后是纳蒂（至 1879 年），再就是里奥（至 1917 年），最后是列昂内尔。纳蒂同时还是公会联合会的名誉总裁、犹太人免费学校的总裁、英国犹太人协会的副总裁和贫民救济会卫生与法务委员会理事。里奥继任了免费学校的总裁，同时也是犹太穷人临时庇护所的副总裁。罗斯柴尔德同时还影响着《犹太新闻报》，当时由埃希尔·迈尔斯所拥有（后来被犹太复国主义者利奥波德·格林伯格在 1907 年收购后，罗斯柴尔德的影响力就不复存在了）。在法国，罗斯柴尔德家族修建了几座新的犹太会堂，包括位于维克多大街的一座（1877 年）以及其他由埃德蒙在 1907 ~ 1913 年间提供资助的三座。相比较而言，维也纳的罗斯柴尔德较少与他们的犹太同胞交往。

可以肯定的是，罗斯柴尔德首要关注的并不仅局限于一个单独的社区，而不关注另外一个或者几个具有相对独特性的社区（除了联合公会，这个组织里也包括了西班牙和葡萄牙籍的犹太人、改良派，以及由东欧移民建立的数量不断增长的东正教组织）。对于挑战纳蒂地位的情况，一个最经常被引用的例子是 1887 年成立的公会联合会，这个组织由贵金属商人兼政治家塞缪尔·蒙塔古提出，目的是为那些东正教组织提供庇护。纳蒂曾一度对他所见到的东伦敦的“精神匮乏”而忧虑，而且在联合会成立的时候，他被选为总裁。但是在 1888 年 12 月，在联合公会委员会上就是否接受联合会进入伦敦宰牲理事会（监管屠宰的机构）的问题上产生对抗后，他被迫把这个职位让给了蒙塔古。看起来他所希望实现的似乎是把联合公会的权

利置于这些新成立的组织之上——因此，他原本在怀特契佩尔路上建立一个犹太会堂的计划就与建一个“犹太人汤恩比大厅”联系在了一起。

然而，对于这件事意义的重要性也不应该过分夸大。事实上，纳蒂还保留了名誉总裁的头衔，而且甚至还主持了联合会 1892 年在新路上的第一个犹太会堂的开幕仪式。确实，他对团结各个不同的犹太组织所报以的期望，在联合公会中的所有理事中，最受蒙塔古的欢迎。在已经在位了很长时间的大拉比内森·马卡斯·阿德勒于 1890 年去世之后，尽管遭到了阿德勒的儿子和继任者赫尔曼的反对，纳蒂终于还是召集了各个公会的代表大会，他的理由是“时机已经成熟，就算是社区中最底层的人们……当然也是最正统的教徒，应该邀请社区的其他分支来加入我们，并把我们都团结起来。我不敢说团结到某一个领导人之下，但是应该团结到一个精神领袖之下”。然而，事实证明根本无法把这些正在竭力竞争对不同社区的影响力的各种势力调和起来；1910 年的一次类似的尝试再一次因为同样的原因而告失败。不过纳蒂还是有足够的势力确保对约瑟夫·赫尔曼·赫兹在 1912 年继承阿德勒作为大拉比的任命能够顺利通过，这主要得益于（有这么一种说法）米尔纳勋爵的大力推荐，尽管更为可能的原因是他看到赫兹更能得到联合会和联合公会对于伦敦东区东正教和同化情况比较严重的伦敦西区的两部分势力的共同认可。

如果纳蒂的影响力在一个基本的宗教问题上都能有如此大的施展空间的话，那么对于与犹太社区有关的那些更偏重于政治方面的问题，纳蒂采用准君王的方式来处理就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了。作为所有犹太家族中最富有的家族的继承人，一位在金融界响当当的人物，又是议会议员，而且后来又成为了贵族，而且还是一位可以直接见到当时最高层的政治家的非正式外交官，他根本就找不到任何对手。或许要让不同的犹太人组织认同一个单独的精神“领袖”不大可能，但是很少有人怀疑纳蒂是他们事实上的世俗领袖。

要全面理解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有必要先全面认清影响深远——而且令人震惊——的这一时期犹太人在欧洲的地位所引发的问题。当纳蒂成为贵族的时候，阿尔方索的反应是意味深长的。“这个消息将会在奥地利和德国引起极大的反响，”他写道，“那些地方的反犹太人气焰仍然相当嚣张。”19 世纪

末期出现了很多变化，先前曾经不是连续的而且只是政治上的对犹太人的种族歧视，现在逐步变成了一种看上去更有组织的政治运动。“反犹太主义”这个词形成于这个时期并不是巧合：种族理论研究提出的假说对于犹太人反社会行为的解释，更多是基于他们的基因，而不是他们的宗教。由于随着大众教育的发展和公民权利的更加广泛，政治生活变得更加民主，1877 年以后的时间里出现了大量的反犹太人书刊、演讲和政策（在某些国家，比如俄国）。罗斯柴尔德家族与从东欧和中欧西进的犹太人之间除了共同的宗教信仰之外，几乎没有其他任何相似之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他们属于富裕的社会精英，而且已经跨越了那些存在于西欧社会的意识形态领域里的社会障碍。然而，从 19 世纪 20 年代开始，罗斯柴尔德家族就一直是左派和右派之间的政治攻击目标，而且无法避免地一再成为“犹太人问题”的人格化代表。这是作为“犹太人之王”的不好的地方。

反犹太主义

20 世纪中叶出现的事件经常会诱使我们夸大 19 世纪晚期出现的反犹太人浪潮的重要性。对国家社会主义的记忆也总是把我们的注意力最先引向德国去寻找反犹太人主义的种种证据。当然，那些地方确实存在一些这种类型的问题（奥地利要比德国更严重，在那里，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金融影响力日渐衰落）；英国也有很多这方面的迹象，而俄国则是唯一从制度上歧视犹太人的大国。法国虽然是比所有地方都更能让犹太人享有平等权利的国家，但同时也是出版反犹太人书刊最多的国家。

一个并非不重要的事实是，把反犹太人主义这个特别有种族主义色彩的词介绍给德国政治家的威尔海姆·马尔，年轻的时候曾经为威特姆斯坦家族工作过，而这个家族与维也纳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关系非常密切。根据一份未公开的备忘录的说法，马尔回忆了他是怎样在 1841 年被解雇的，尽管他在公司工作得比大多数犹太雇员更努力。他非常痛苦地说道：“应该承担经济危机后果的是犹太鬼。”这种看法似乎得到了很多在 1873 年经济崩溃后面临经济困难的德国人的共鸣。由马尔这样的作家煽动起来的反罗斯柴尔德声浪的

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法兰克福犹太人与对人民福利的掠夺》，该书于1880年由“日耳曼尼克斯”出版，书名就很说明问题。作者从大家已经非常熟悉的选帝侯的财富故事断章取义的版本入手，书中将德国在大繁荣时期及之后的经济困难与深受罗斯柴尔德家族以及他们豢养的金融与传媒界的走狗鼓励的资本输出（特别是输出到俄国）联系在一起。在人们还没有来得及消化这些指控的时候，黑森-德意志帝国议会代表奥托·波克尔在1890年又提出了一项指控，他认为罗斯柴尔德家族已经用石油把世界市场逼上了绝路——这项指控5年后又在柏林被社会民主党的刊物再次引用（说明这套说辞随时都可以被左派随意使用）。弗雷德里克·冯·谢尔布1893年的《罗斯柴尔德商号历史》一书进一步把这个观点进行了细化，说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巧取豪夺又有了一个新的目标：控制国家贷款，然后是铁路建设，现在他们开始寻求建立全球原材料的垄断。

到1911年，当维尔纳·桑巴特发表带有很强烈的倾向性但很有影响的《犹太人与经济生活》一书的时候，这样的声讨得到了来自知识界的一定程度的认同。对于桑巴特来说，“罗斯柴尔德的名字”所代表的“远远大于使用这个名字的那些公司”；也就是说，意思是指“所有那些活跃在交易所里的犹太人”：

因为只有在他们的帮助下，罗斯柴尔德家族才能够取得这种超级权势的地位——事实上，人们可以公正地说他们是债券市场上唯一的掌控人——这种地位我们已经看着他们拥有了半个世纪。过去有人说，一个财政部长如果疏远了这家世界性的企业，而且拒绝跟它合作的话，那么他就得考虑走人了，其实这种说法一点都不夸张……无论是从数量上考虑还是从质量上考虑，现代的交易所是罗斯柴尔德式的，而且因此也是犹太人式的。

但是也没有必要就此把反犹太人主义的根源确立在这类伪社会学的基础上，犹太人与日耳曼人的人种差异可以很容易地说明问题。马克斯·鲍尔的小册子《俾斯麦与罗斯柴尔德》（1891年）将俾斯麦这位日耳曼人的代表、

拥有着农民美德的人与罗斯柴尔德这个俾斯麦的世界性对立面进行了对比：

他生存的原则不是建设性力量的稳定增长，而是大量被分割的资金急速而令人担忧的聚集……但是（俾斯麦认为）就让犹太人去满足他们贪得无厌的快乐；一旦 50 亿马克完全付清，那么就该轮到德国人用自己的方式让自己高兴了……俾斯麦的物质和精神的形式所有人都是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实实在在……但是这个世界对于罗斯柴尔德的物质看法是什么样的呢？他们从来都是隐形的，就像绦虫一样永远附在你的身体里，但又无影无踪。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银行”是没有结构的、像寄生虫似的，形式上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的，从法兰克福和巴黎再到伦敦，遍布整个地球，就像一团缠在一起的电话线。它既没有结构也没有生命，是一种不在地球上生长的东西，一种不会朝向上帝的东西。俾斯麦的精神像一座歌德似的建筑……这是在我们现在的政治文化中两种完全相互敌对的力量：贪得无厌的犹太人，他们摧毁生命；亲和的德国精神，它创造生命。

在奥地利也有类似的出版物，但是在那里，因为罗斯柴尔德家族仍然是主要的经济力量，因此，与德国的情况不完全一样，反犹太人主义更多的是以政治影响的方式出现。在 1873 年维也纳股票市场崩溃后，卡尔·鲁伊格策划了“基督徒社会”运动，来反对犹太人的金融势力。这次运动出现的一个转折点是鲁伊格在 1884 年呼吁对罗斯柴尔德拥有的凯萨·费迪南德·北方公司进行国有化，而当时政府正好提出重新延续 1836 年授予萨罗曼的特许权。鲁伊格提出的要政府“倾听一次人民的声音，而不要只听罗斯柴尔德家族一面之词”的要求，得到了乔治·施尼勒领导的日耳曼人全国理事会的积极响应，而当阿尔伯特由于在奥地利—匈牙利货币改革中所起的作用于 1893 年被授予铁十字勋章时，更像是往他们的怒火上又浇了一盆油。然而，当鲁伊格在 1897 年坐上了维也纳市长的宝座时，他马上发现想要抛开罗斯柴尔德家族是多么困难。到 19 世纪 90 年代末，保守派批评家像卡尔·克劳斯（他自己本来是犹太人出身）以及社会民主党的报纸《劳动新闻报》，都谴责鲁伊格

“与罗斯柴尔德家族交好”，甚至“与犹太人罗斯柴尔德携手工作”。与此同时，通过采用传统的哈布斯堡方式，《犹太人杂志》又批评罗斯柴尔德家族雇用反犹太人主义人士多于雇用犹太人！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势力依旧，甚至在那些没有把握政治之斧的人中也有足够的影响力。例如，泰罗尔诗人、地质学教授阿道尔夫·皮奇勒在1882年的评论中，说起“罗斯柴尔德”怎样使“奥地利政府债券的奥林匹亚山摇摇欲坠”。他嘲讽地补充道，这完全是“一次庄严的投机”。

但是法国才是反犹太人主义最为明确而且最广为泛滥的地区。19世纪80年代出现的如潮水般涌现的反对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出版物的那种壮观景象，恐怕在整个19世纪的历史上很难再找出什么可以与之类比，甚至1846年北方铁路事故后出现的大规模的书籍大战所导致的巨大伤害也无法与之比肩。这一次，导致灾难的“事故”是有教会背景的大众联合银行（Union Générale Bank）在1882年的倒闭。大众联合银行刚宣布清盘，它的创始人保罗·尤金·本图克斯就开始指责“犹太金融”及其“狼狈为奸的政府同盟”。这篇指责性的文章由报纸进行了连载，《里昂观察报》宣称是“由来自德国的犹太银行家集体主导的一次阴谋”，是一场“德国犹太人的阴谋”。

说起来也许有些矛盾，参考后来在德雷弗斯守卫者事件中的作用，没有任何一名作家比小说家埃米尔·左拉更适合让这种观点流传于世了。尽管身处第二帝国，他的小说《金钱》——他的鸿篇巨著《卢贡·马卡尔家族》系列的组成部分——很明显受到了大众联合银行倒闭的启发（有部分情节暗指地产信贷银行）。尽管主角甘德尔曼并不是以阿尔方索为原型，但毫无疑问的是，无论他以谁为原型，有很多方面均取材于阿尔方索已故的父亲詹姆斯。这个直白复原的角色有一种怪诞的性格，他缺乏巴尔扎克笔下纽沁根救赎的仁慈（纽沁根是以詹姆斯为原型创作的又一个伟大的文学人物）。对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找到的最好的解释是左拉对詹姆斯的了解不如巴尔扎克；在他去世后10年，他的创作仍然在为其他人提供灵感，而事实上，《金钱》的有些段落摘自于费多。书中对早期的甘德尔曼是这样介绍的：

银行之王，交易所的主宰，也是世界的主宰……这个人知道所有的

秘密，他可以随心所欲让这个市场上涨或是下跌，就像上帝那样翻云覆雨……黄金之王……甘德尔曼是真正的主宰，全能之王，整个巴黎、整个世界都敬畏他、服从他……人们已经看到甘德尔曼在巴黎的统治更加稳固，而且他的朝廷受到的尊重远甚于皇帝。

他是一位冷峻、精于算计、整天阴沉着脸（一个编造的特征）、生活严谨的工作狂。相反，萨卡德是一位冲动的一心想跻身金融界的年轻人，他像神职人员一样虔诚，梦想着能够接到巴尔干地区和中东地区的金融大单，让他赚到大钱后能够把耶路撒冷买下来，并在那里重建一个政教合一的政权。为了取得甘德尔曼的支持，他满怀希望地去甘德尔曼“恢弘的公馆里”去拜见他，而这座公馆是他工作并与一大家子人共同生活的地方，跟他一起住在里面的有5个女儿、4个儿子和14个孙子。我们再一次进入了拉斐特大街上那王宫般的房子里，在里面一队队的经纪人依次走到冷漠的银行工作人员面前，银行人员对待他们的态度相当麻木，或者——如果他们胆敢来打搅——满脸不耐烦；在某处，那些艺术品商人使出浑身解数，想把他的注意力从那些外国大使身上引开。在另外一个地方有一个五六岁的男孩突然闯入，骑着扫帚柄、吹着喇叭。这个古怪大堂在萨卡德的眼里活脱脱就是一个甘德尔曼的“世界朝廷”。

萨卡德希望得到甘德尔曼的支持——事实上是渴望能像他一样在交易所里赚到钱。然而，由于他一直认为“犹太人”本应该是“诚实的人，靠自己的汗水生活”，因而他被“无法压抑的仇恨”所击倒：

这个不再有自己的祖国，不再有自己的王子的民族，寄生在别人的国家，假装服从当地的法律，但是事实上他们只服从自己那位偷盗、嗜血、仇恨，而且使每个角落都弥漫着残暴的征服和厮杀的上帝……（他）在那里坐等掠夺，吸干所有人的血，牺牲别人的生命养肥自己。

在萨卡德看来，犹太人在金融方面的能力天生就比基督徒优越，而且他预见到——甚至在他进入到甘德尔曼办公室的时候——“犹太人将会征服全

人类”。

当甘德尔曼没有任何悬念地回绝了他的计划的时候，萨卡德的憎恶变得非常强烈：“啊，肮脏的犹太人！一定会有人很高兴地用牙啃噬你，就像狗啃骨头，尽管这肯定是非常可怕的，而且也非常难以下咽。”“帝国已经被卖给了犹太人，肮脏的犹太人。”他狂喊道：

我们所有的钱注定要落入他们丑陋的手掌。在他们的魔力面前，世界银行除了分崩离析外，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的作为……他发泄着他那与生俱来的仇恨，反复谴责那些商人和高利贷者。他们在整个世纪都在与其他民族作对，而且从他们的身上吮血……对整个世界的某种方式的征服，这一天注定要到来，他们将用所向披靡的金钱的力量达成……啊！那个甘德尔曼！一个彻头彻尾的普鲁士人……他不敢在某天晚上的沙龙上说，如果普鲁士和法国之间爆发战争，那么法国注定是失败的！

最后，当然是甘德尔曼胜利了：世界银行倒闭了，而萨卡德在监狱里了此余生，一觉醒来之后，给他留下的只是一颗破碎的心和一只空空如也的荷包。

没有人会责怪左拉没有做足他的功课——不仅是没有按照实际认真描写詹姆斯的办公室，而且对大众联合银行的兴衰说得也不准确——狂卷教会和贵族的存款、哄抬自己的股价，直至最终导致崩盘。但是左拉从文字上为下面的两种说法增加了可信度：一是大众联合银行是被罗斯柴尔德搞垮的，二是法国罗斯柴尔德是亲德国的。这些说法在第三共和国的法国人中引起的共鸣是很表面化的。盖伊·德·卡奈斯的《吸血男爵》是一本影响力与《金钱》一样坏的书，它所传递的信息也没有太多的不同。书里的人物若布·希穆尔与甘德尔曼一样，也是一个德国籍犹太人，具备天生的金融操控天赋。他是一只“掠食的大鸟”，大发战争横财，然后摇身一变，成了拉孔尼兹男爵，并通过给那些身无分文的男爵夫人提供咨询来换取他们的社会承认。这些老套的故事在本图克斯于1888年发表了自己的自传后流传得更为广泛。尽管本图克斯没有提罗斯柴尔德的名字，但是当他提到“犹太人银行”时，几

乎所有人对他指的是谁心知肚明，他说这家银行“不满足于 50 年来已经流入它的金库的几十亿元……不满足于对至少 9 成的欧洲金融事务的垄断”，因而谋划着毁灭大众联合银行。

然而，对法国反犹太人思潮做出最大的个人贡献的，或许是另一位郁郁不得志的人——爱德华·杜鲁蒙特。爱德华·杜鲁蒙特年轻的时候曾经在地产信贷银行工作，并且花了很多年研究并撰写了大量冗杂的长篇大论，目的都在于全面完整地描写犹太人对法国经济和政治生活的统治地位。这本书在 1886 年首发后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后来先后再版了 200 次，法国犹太人的称谓成为了一个有种族意义的，而且具有反法籍犹太人特点的概念，并逐渐发展成为了一套伪思想体系。因此“罗斯柴尔德家族尽管腰缠万贯，但看上去总像是卖二手衣服的旧货商人。他们的妻子尽管挂满了来自高尔康德的钻石，但看上去总像是他们家里清扫厕所的女工”。当话题转到珠宝上的时候，甚至连非常老辣的男爵夫人贝蒂都无法掩饰她作为“法兰克福犹太人”的本性。从有些方面看，杜鲁蒙特只是在 19 世纪 40 年代那些小册子的基础上进行了补充（当时戴恩维勒是主要的煽动者），因此第一卷的主要内容集中反映的是罗斯柴尔德家族过分的政治权力的观点：对滑铁卢战役结果的投机、他们在北方铁路特许权上获取的巨额利润、他们对更具有公关精神的彼埃尔家族的仇恨。古德绍——一名犹太人——在 1848 年的时候把他们从破产的边缘上拉了回来，而且在 1871 年的纵火案中，是在公社里的犹太人保住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财产。共和后的政治家们只是这个故事的延续：甘贝塔与犹太人和共济会有染，莱昂·塞——“犹太王的忠臣”——起到了类似的作用，而喀尹这位最高委员会主席只是北方公司这部犹太人—共济会巨型机器的一个很小的环节。甚至朱利斯·费瑞的衰落都可以归咎于罗斯柴尔德的邪恶影响。最为严重的是，杜鲁蒙特认为大众联合银行事实上是一个精心策划的犹太陷阱，它的目的就是为了掠夺那些牧师们的积蓄。

杜鲁蒙特后来发表的《一位反犹太分子的证言》（1894 年）进一步发展了这些恶毒的观点，部分原因是为了解释这场反犹太人运动所产生的有限的政治成果。在这篇文章里，他采用了一种更为伪经验主义的风格，计算出他假定的罗斯柴尔德家族 30 亿法郎的财富可以换算成多少标准银子，需要多少

人才能搬动它，并且比较了罗斯柴尔德家族所拥有的土地的数量与基督徒所拥有的数量；认为如果布朗热分子回避了反犹太主义，我们所能找到的唯一的原因只是因为“罗斯柴尔德为他们的市政选举提供了 20 万法郎，要求的条件是候选人不得采取反犹太人的行动”，而且因为布朗热分子领导人拉盖尔个人得到了 5 万法郎；如果法国经济出现萧条，原因只可能是因为“莱昂·塞……把法兰西银行拱手交给了德国犹太人”，允许罗斯柴尔德家族将它的黄金借给了英格兰银行；如果法国被国际社会孤立，只可能是因为罗斯柴尔德家族将埃及让给了英国，并用法国的资金为意大利的军备提供了资助。最后这项缺乏爱国情操的指控在几年之后的《反对法国的犹太人》（1899 年）一书中被再次提起。杜鲁蒙特这样总结道：“罗斯柴尔德神是法国真正的主人——既不是皇帝、不是沙皇、不是国王、不是苏丹，也不是共和国总统……他没有任何权力及优势，他为了自己的私利，废除了所有这些政府势力，废弃了法国的所有资源。”

杜鲁蒙特只是当时那些把火直接引向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反犹太写手中最为多产的一个。另一个类似的也是造谣中伤的写手是奥古斯特·希拉克（Auguste Chirac），他的《共和群王谱》（1883 年）把那些老掉牙的陈腐故事，比如选帝侯的财富和滑铁卢等与新的关于北方铁路和罗斯柴尔德家族与 1848 年以及 1870 ~ 1871 年的几次革命的关系搅和在一起；再一次在争论中引入了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维度——罗斯柴尔德家族不仅是犹太人，同时还是德国人，因此他们急迫地想通过为 1815 年和 1871 年的战争赔款进行融资，进而搞垮法国。希拉克后来的另一本书《1870 ~ 1884 年间的投机》（1887 年）是一本较为成熟的著作，它试图通过大众联合银行发生危机前后出现的债券价格波动的分析，来解释罗斯柴尔德家族那一段时间的利润情况，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大众联合银行本身就不是一个理性的企业，但是他再一次妥协了，又采用肆无忌惮而且毫无根据的理由，对罗斯柴尔德家族和莱昂·塞进行了指责。虽然是肤浅的经验主义之谈，但这事实上是又一次诽谤，他声称这是“金融封建主义的胜利以及对工人阶级的压迫”，而且是由“名叫罗斯柴尔德的国王与一位名叫犹太金融的妓女或者是女仆”联手对共和国进行的控制。这本书里所提出的主要指责内容是罗斯柴尔德家族为了英国的利益参与了破